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

20 SHIJI ZHONGGUO
MINJIAN GUSHI YANJIUSHI

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

万建中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 SHIJI ZHONGGUO
MINJIAN GUSHI YANJIUSHI

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

万建中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万建中著.—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303-12853-2

I . ①2… II . ①万… III . 民间故事—文学研究—中国—
20世纪 IV . 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1273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 mm × 210 mm

印 张: 10.87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赵月华 于乐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茜 **责任印制:** 李 喻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目 录



CONTENTS

引 言 发展轨迹与书写动机	1
一、百年故事学简历	3
二、书写故事学史何以可能.....	31
第一章 民间故事体裁特征的认识	39
一、塑造民间故事的体裁形象.....	40
二、民间故事体裁学研究的深入.....	65
第二章 民间故事书写研究	79
一、书写原则的确立与追求	79
二、故事文本制作的实践经验	88
三、对书写文本的反思	98
第三章 民间故事研究方法的学术实践	106
一、学术实践的特点	107
二、文化人类学	111
三、比较故事学	125
四、历史地理学派	142
第四章 民间故事类型学研究	149
一、类型研究的文本基础	150
二、故事类型谱系编写进程	155
三、类型研究的发展前景	164
四、民间故事类型个案研究范例	171
第五章 民间故事专题研究	207
一、民间故事的叙事范式	207

二、母题(主题)概念的引入与运用	214
三、民间故事传承与演变	222
四、民间故事的现实意义	232
第六章 钟敬文的民间故事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系列	
论文为考察对象	255
一、关注故事类型比较研究中“差异”	257
二、结尾：寻求不足与问题意识	263
三、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与研究空间的拓展	267
第七章 故事家考察的学术诉求	274
一、故事家的发现与考察	275
二、故事家的生活史记录	282
三、故事家的个性特征	288
四、田野中的故事家	292
第八章 书写中国民间故事学术史	297
一、民间故事领域学术史	299
二、历时性视角的学术史书写	307
三、新世纪初学术史书写态势	311
结语 局限与前途	315
一、20世纪的不足	315
二、故事学新视野	323
参考书目	334
后记	344

引　言

发展轨迹与书写动机

中国现代民间故事研究已走过了百年的路程，内容和经验非常丰富，这是一个值得并且需要探询和重新审视的过程，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清理、归纳和总结。这也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段极其厚重的历史。这项历史书写工作的展开，对进一步推动中国故事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可以将中国故事学研究引向深入，又能使中国故事学以其独特的业绩与西方故事学进行对话。

讲故事是人类最古老且最基本的话语(*discourse*)方式，是人类生活中一项不可少的文化活动，不讲故事则不成其为人。^①“据有的学者推断，故事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从新石器时代那些原始人的头骨形状，就可判断他们已经在听讲故事了。”^②

谁也不会否认，我们是一个好讲故事和听故事的民族。在民间，勾栏瓦舍是讲说民间故

^① 参见[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中国叙事学》，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② 刘守华：《比较故事学引言》，载《民间文学论坛》，1994(2)，20页。

事的场所，“宫廷内讲故事活动，自汉至清末有停止过。”^①中国民间故事的文化遗留极为丰厚，德国学者艾伯华说过：“我们通过所能看到的1000年至3000年民间故事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民间故事的发展过程。对于这样的调查研究，中国是个非常理想的地方，因为除了中国以外，大概不会有任何一个地方能使我们看到在一个时间跨度大而又顺利发展的民族文化中有如此完整的民间故事。”^②另一位西方学者也曾发出同样的感叹：“中国是民俗学者的乐园。中国人们经历了一切，吸取了一切，并且什么也没有忘记。几乎没有一种信仰、一个故事或一种习俗不是仍然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某些最遥远的地方。”^③然而，在古代中国，发达的是以抒情行为及其产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诗学。上层文人为了获取文人的头衔，一概撇开了民间故事文体，而专注于诗意的寻觅和营构。但这些浩如烟海的诗篇并不能真正进入民间，乡民们仍旧我行我素，讲故事和听故事。

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文人一律倒向了诗，而抛弃了故事呢？这种创作理性的出发点是什么呢？这是由这两种体裁的性质所决定的。对此，闻一多先生很早就有过精辟的论述：“故事是民间的产物，不用讳言，它的本质是低级的。（便在小说戏剧里，过多的故事成分不也当悬为戒条吗？）正如从故事发展出来的小说戏剧，其本质是平民的，诗的本质是贵族。”^④作为

① 谭达先：《赞刘守华著〈比较故事学〉的重大成就》，见《论中国民间文学》，319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② [德]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4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③ [美]R. D. 詹姆森：《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122页，上海，上海民间文艺出版社，1995。

④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见《闻一多选集》，1卷，365～367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

“低级的”民间故事而言，为历代文人所鄙视乃实属必然。

中国古典学术全然拒绝了故事学。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在眼光向下社会思潮的感召下，高雅的学术下嫁到民间，学者们纷纷关注民间故事和故事的讲述活动，故事学应运而生。20世纪的中国故事学无论运用何种范式，秉承何种学术宗旨，依然都是围绕民间故事本身存在的重大主题展开：为什么要讲故事？故事如何存在于民间生活之中？

一、百年故事学简历

1907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与周作人合译了《红星佚史》(原名《世界欲》，延至1913年8月，周作人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了《童话研究》一文，^①正式拉开了我国现代民间故事研究的帷幕。紧接着，一大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参与到中国民间故事学的建构之中。到20世纪结束，我国民间故事学已经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在这近10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民间故事研究从稚嫩走向成熟，经历诸多研究方法的实践，发展成为民间文学学科中相对独立的分支。这段历史需要回顾、梳理和总结，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的缩影。可以肯定，20世纪中国故事学是一个层累构建的过程，呈现复数的状态，在不同的学术语境中表现为差序的书写范式。西方故事学理论的不断引入，青年学者的纷纷涌现，民间故事文本

^①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收录了《童话研究》全文，编者王泉根书写的“砚边小记”中有这样的说明：“本文原载1913年8月北京《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7期……据资料介绍，本文于《童话略论》最先刊载于1912年6月6日、7日的绍兴《民兴日报》；后经鲁迅推荐，周作人重新修改后，又发表于1913年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由此扩大了这两篇文章的影响。从现有资料考察，本文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第一篇探讨童话的论文。”

的大量发掘，使中国现代故事学研究显示出层层深化的发展态势。

20世纪民间故事学作为现代民间文学学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演进的脉络与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是一致的，大略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发生期(1907—1937)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产生，是以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发起的北大歌谣征集运动为标志的。1922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沈兼士任主任，北大歌谣研究会乃归入国学门，由周作人负责。1922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创刊，并由周作人、常惠任主编。他们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研究在现今的中国是很重要的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①《歌谣》周刊的诞生，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思想的崛起，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现代故事学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正式全面展开。伴随歌谣学运动的蓬勃展开，现代民间故事学的序幕也骤然拉开。随即，掀起了民间故事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中国现代故事学起始的时间要远早于歌谣学，其正式诞生当以周作人在1913年至1914年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的《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和《古童话释义》为标志。《童话略论》是我国较早介绍并高度评价英国人类学派民俗学的一篇文章，其运用这一学派的民俗学方法解释神话、世说、童话，令人耳目一新。而《古童话释义》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一篇关于民间故事的重要论文，是中国民俗学最早的重要成果。^② 翻检

^① 周作人：《〈歌谣周刊〉发刊词》，载《歌谣周刊》，1922(1)。

^② 刘锡诚：《中国民俗学的滥觞与外来文化的影响》，见《中国俗文学七十年——“纪念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刊七十年暨俗文学学术研讨会”文集》，16~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美国学者洪长泰的《到民间去——1918—1937 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一书，可以获得下面这些当时关于故事学研究的概述性的句子：孙毓修“最早把大量的西方童话介绍到中国”，“他的开拓劳绩是世所公认的”；周作人“率先翻译了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等世界名著”；茅盾“也亲自动手翻译过西方童话”。赵景深的《童话概要》(1927)、《童话论集》(1927)和《童话学 ABC》(1929)等一批专著，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他是中国现代童话理论体系的少数建构者之一”。《童话学 ABC》列入世界书局刊行的百科全书式的“ABC 丛书”之一，可说是我国“从民俗学上立论”(作者例言语)，运用西方人类学派的研究方法，通过故事文本来探寻远古民间风俗、信仰最早的专著，在当时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其他重要的研究者还有“钟敬文、郑振铎、叶绍钧”。“在系统收集传说故事方面，用力最勤者，当数李小峰(笔名林兰)”，他编辑的《徐文长的故事》《朱元璋故事》《历代名人趣事》《历代文人的故事》等，“对于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真是无价之宝”。“当时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研究高潮的到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期刊杂志上登载的这类成果日益增多，二是相关研究著作的大量出版。”^①

人们习惯于把 1937 年以前的中国民俗学划分为北京大学时期、中山大学时期和杭州时期。相对而言，北京大学时期的学术用力主要在歌谣方面，而民间故事没有得到重视。到了中山大学时期，对民间故事的重视逐渐超过了歌谣，“纵观此期间《民俗周刊》的成绩……其中以故事的报告资料较多，以《文昌县故事三则》为例，在此报告中，一篇就叙及三个故事。因

① [美]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 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217~219、136、134 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此，如果只就统计数目而言，故事是相当多的。”^①1930年，钟敬文与钱南扬、娄子匡、陶茂康等在杭州创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在故事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娄子匡的《巧女与痴女的故事》、刘大白的《坛子的故事》、钟静闻（敬文）的《老虎外婆故事集》《中国民间故事型式》等均为重要之作。

纵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故事领域的实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搜集整理和出版数量众多，水平极高。如果说，当时民间故事的研究范式处于邯郸学步层次的话，民间故事写定的理念和水平则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即便是如今的许多民间故事记录文本与之相较，也是望尘莫及的。诸如林兰编的故事集40本、谷万川编的《大黑狼的故事》、娄子匡编的《巧女和呆娘的故事》、钱南扬编的《祝英台故事集》、刘万章编的《广州民间故事》、刘大白辑录的《故事的坛子》、孙佳讯编的《娃娃石》等等，都是民间故事由口头语言转化为书面语言的经典。

当时的民间故事记录文本之所以保存了比较浓郁的地方色彩，主要原因在于记录者所记录的大多是家乡的民间故事。比如广州揭阳的林培庐，潮汕民间文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搜集出版了著名的《潮州七贤故事》（包括《潮州前七贤故事》《潮州后七贤故事》《潮州历代文人故事》），并由著名民俗学研究专家容肇祖、周作人、赵景深等为之作序。容肇祖在《序言》中写到：“捧诵之余，钦佩无量。故事之造成，地方风俗之习惯与崇尚，即可于说话之间，粗得一些梗概。”由于记录者谙熟当地方言和地方文化传统，写定故事文本自然可以力求原汁原味。

二是民间故事类型谱系的确立与故事类型研究。自杨成志和钟敬文翻译出版了《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之后，学者们纷纷

^① [日]直江广治：《中国民俗文化》，18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投入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发现与研究之中。钟敬文先生身先士卒，搜集归纳了我国的民间故事型式，并发表了《中国民谭型式》(《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和其他专题论文。《中国民谭型式》一文，破天荒借用了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来展开中国故事学研究，这其实就是现代故事学的真正开篇。因为此前所有关于民间故事的讨论都只停留于“什么是民间故事”上，还没有显现现代批评方法的意识，而这篇文章所体现的分析眼光与方法已经开始突破传统批评的框架，表现出钟敬文先生试图借助外力刺激以推进中国故事学发展的学术自觉。如果说周作人和赵景深等早期故事学家都是从“教育”的立场进入故事学领域的话，那么，钟敬文先生则开启了纯粹的“学术”境界的故事学。这篇文章在中国故事学史上的地位应该远远高于现有的评价。受钟先生等学者的民间故事类型学成果的直接影响，赵景深发表了《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发端——英国谭勒研究的结果》一文。数年后，德国学者艾伯华也完成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书，归纳出 246 种故事类型。

“30 年代，是我国民间故事学学术研究的高峰。这一时期，我国故事研究者从各自擅长的角度出发，对民间故事进行了多角度的专题性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从人类学角度用进化论对故事进行专题性研究者，占有突出地位。”^①在具体的民间故事类型方面，除了钟敬文的数篇论文之外，不能不提到美国著名学者 R. D. 詹姆森撰写的三篇论文。1932 年 3 月 21 日、3 月 28 日和 4 月 4 日，他在北平华北协和话语学校做了 3 次演讲，演讲稿当时就结集出版，命名为《中国民俗学三讲》。^② 这

^① 范利：《进化论与中国人类学派故事学》，见陶立璠主编：《亚细亚民俗研究——亚细亚民俗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155～169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② [美]R. D. 詹姆森：《中国民俗学三讲》，北京，中国北平三友书社，1932。

三篇经典论文研究的对象都是著名的民间故事类型：即灰姑娘型故事、狐妻型故事和受虐待的皇后型故事。作者以一位西方学者的眼光，运用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派的分析手段，讨论了这三种故事类型的各种异文，由此开创了比较故事学的先河。在此书再版的序言中，钟敬文先生说：“我们应该诚恳承认，詹教授这部著作，在中国民俗学史上（包括本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的研究在内）是应该占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位置的。”^①

三是现代故事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在民间故事学滥觞之时，当以周作人关于童话的三篇论文为代表，在《童话研究》（1913）、《童话略论》（1913）和《古童话释义》（1914）中，通过对神话、传说与故事（童话）三种文体的比较分析，确立了故事（童话）在民间叙事中的独特地位。这三篇文章“各有所重，形成一个互有联系的整体，集中反映了他对童话起源、发展、特征和价值等方面内容的深入探索。”^②1932年3月，上海儿童书局出版了他的一本论文集《儿童文学小论》，收录了他发表于绍兴教育专刊的《童话研究》《古童话释义》《儿歌研究》等论文。对应于周作人的“三童”，赵景深极与之进行直接对话，也出版了“三童”，这是运用早期文化人类学方法解读民间故事的代表性成果。其主要贡献在于打破了当时国外学者在型式研究上把神话、传说、故事混为一谈的非学术倾向，厘清了神话、传说、故事的概念和界限，为故事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石，^③堪称中国现代故事学的先驱和开拓者。^④

^① [美]R. D. 詹姆森：《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序言，1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② 高有鹏：《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段宝林编：《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221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③ 段宝林：《赵景深先生与民间文学》，载《新文学史料》，2002(1)。

^④ 刘锡诚：《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俗文学派——郑振铎、赵景深及其他俗文学派学者论》，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5(第5卷)(2)。

在中国故事学初期，一些基本的概念和问题急需得到讨论，以期获得比较一致的看法和结论。于是当时出现了一种讨论问题的方便形式，就是书信往来。第一次书信讨论在张梓生和赵景深之间展开。^①主要是赵景深就童话的界定、国外的研究现状等问题向张梓生咨询，张梓生同样以书信的形式，就赵景深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复。第二次书信讨论则是在当时故事学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之间展开的。在 1922 年 1 月 9 日至 4 月 6 日之间，赵景深和周作人有 9 次通信，^②就童话一词的由来，童话的本质、范围、文体特征、传播状态，与民间其他散文叙事文体的关系，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作用，童话世界的艺术魅力等童话学的基本内容进行了十分细致的信息交换。这 9 封书信随即见诸报刊《晨报副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大大促进了中国民间故事学基础理论的建设，也为赵景深日后“三童”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四是翻译出版国外童话故事集并积极吸纳西方故事学理论。除了杨成志和钟敬文翻译出版了《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之外，赵景深还翻译了耶阿斯莱的《童话学 ABC》、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及其《童话学》、^③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④1930 年，出版了日本学者卢谷重常的《世界童话研究》，^⑤1935 年出版了另一位日本学者松村武雄的《童话与儿

^① 张梓生、赵景深：《童话的讨论》，见赵景深编：《童话评论》，上海，上海新文化书社，1924。

^② 赵景深编：《童话评论》，65～73、171～173、237～240 页，上海，上海新文化书社，1924。

^③ 载《文艺创作讲座》（第 1 卷），上海，光华书局，1931。

^④ 《民间故事的探讨》和《神话与民间故事》，见《童话论集》，上海，开明书店，1927。

^⑤ [日]卢谷重常：《世界童话研究》，黄源译，上海，华通书局，1930。

童的研究》。^①另外，杨成志所译的英国班恩女士的《民俗学问题格》、江绍原所译英国学者瑞爱德的《现代英吉利谣俗与谣俗学》、李璜所译法国学者葛兰言的《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胡愈之所译法国学者倍松的《图腾主义》、林惠祥根据班尼女士的书并参考其他国外资料写成的《民俗学》^②等，对民间故事的研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现代民间故事学先驱的周作人曾说：“他对民俗学是如此地倾心，留学日本时便读过柳田先生的著作，并准备把此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③早期的故事学家们都还有一个共识，便是故事学研究需要理论和方法，这理论与方法主要依靠引入，而非自产自销。

除了故事学理论的译介外，国外童话故事作品的引入也是成绩斐然。1908年孙毓修编译的《童话》中的作品多属国外的。1917年，周作人发表了《外国之童话》一文，吹响了翻译和研究国外童话的号角。之后，外国童话作品便成为故事学理论言说的重要资源。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夏丏尊的《俄国的童话文学》、^④记者的《童话作家爱罗先珂先生》、^⑤鲁迅的《〈爱罗先珂童话集〉序》、^⑥周作人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⑦和《王尔德童话》、^⑧赵景深的《童话家格林兄弟传略》、^⑨戴望舒的

^① [日]松村武雄：《童话与儿童的研究》，钟子岩译，上海，开明书店，1935。

^②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③ [日]直江广治：《中国民俗文化》，17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④ 载《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1921(9)。

^⑤ 载《妇女杂志》第8卷第1号，1922(1)。

^⑥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⑦ 署名仲密，载《晨报副镌》，1922-03-12。

^⑧ 署名仲密，载《晨报副镌》，1922-04-02。

^⑨ 载《晨报副镌》，1922-05-26。

《鹅妈妈的故事》、^① 郑振铎的《列那狐》、^② 曹建华的《日本童话》、^③ 康同衍的《意大利童话》^④等。1925年，《小说月报》、《京报周刊》(第六种)都开辟了安徒生专栏，掀起了安徒生研究的热潮。西方故事学理论就产生于对西方童话的研究，中国学者重蹈这一学术历程，是西方故事学中国化的第一步，也是不能缺少的一个环节。

五是学术队伍比较庞大，当时几乎所有学者都曾涉足故事学领域。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期间，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李大钊、周作人、胡适、常惠、顾颉刚、容肇祖、孙伏园等，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中的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江绍原、杨成志等，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钟敬文、娄子匡、钱南扬、江绍原等都曾发表过故事学方面的言论。鲁迅、茅盾、赵景深、李白英、钱小伯、胡怀琛、林兰(李小峰)等则在上海从事故事学活动。这些著名学者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却对民间故事产生了共同的兴趣，共同营造出当时故事学热烈的气氛和繁荣的景象。有不少著名学者的文学研究道路肇起于民间童话的研究，譬如，“经过辛亥革命，随着外国童话的介绍和创作的出现，周作人开始了对儿童文学理论的研究，首先是对童话这一文学样式的探索。”^⑤在当时，故事学与歌谣学一样都是“显学”。

一位日本学者指出：“中国民间故事研究这一次高潮期的下限是1934年，高潮结束的标志有二：其一是林兰丛书出版

① 上海，开明书店，1931(10)。

② 上海，开明书店，1931(10)。

③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0)。

④ 上海，中华书局，1934(3)。

⑤ 张香还：《中国儿童文学史》(现代部分)，93页，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

完毕。其二是这一高潮的火车头钟敬文于1934年春离开杭州去日本留学。当时民间文学研究的领袖是历史学者顾颉刚，其余还有赵景深、娄子匡等几位年轻的研究者。当然，最受顾颉刚信任的还是钟敬文，他在1928年至1934年短短几年内，有15篇关于神话、传说、故事等方面高质量论文陆续发表。”^①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在中国民间故事学发生期间，学术取向是比较明确的。1928年，张圣瑜总结了当时故事学的研究状况：“吾人研究，自当先就童话本身确切研究，参证儿童心理，以为化育之具也……”^②初期的故事学研究大致围绕三方面展开：一是童话（故事）的本体论；二是针对童话（故事）能够满足儿童的阅读心理，讨论童话（故事）与儿童教育的关系；三是确立中国民间故事学在世界上的地位。虽然张圣瑜并未谈及后一种学术动机，但其实，这是当时涉足故事学领域学者们的普遍心态。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是“灰姑娘型”和“天鹅处女型”故事最早的记录在中国，这一直为人们所自豪并津津乐道。1908年，孙毓修编译了童话集《无猫国》，号称中国第一本童话。1914年，周作人在《古童话释义》中，明确否定了这一说法，指出：“实乃不然，中国虽无古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特多归诸志怪之中，莫为辨别耳。”^③民间故事是比较典型的对于民族传统的历史记忆，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流行着一些同类型的民间故事，而西方一直否认中国民间故事的历史地位。当时的学者们已经具有民族民间文化的觉醒意识，就是要证实中国民间故事的独特性和原始性。

^① [日]加藤千代：《两种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简说》，刘晔原译，载《民间文学论坛》，1991(5)。

^② 张圣瑜：《儿童文学研究》，7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③ 周作人：《古童话释义》，39页，上海，儿童书局，1932。